

天津建卫六百年

天津的
人口变迁

来新夏 主编
陈卫民 编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人口繁衍说沧桑

自明初永乐二年（1404年）设卫至今，天津城市的发展已经历了600年的历史。600年来，天津从一个最初主要起军事功能的卫城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在此过程中，天津城的面积从最初的不过“城周九里”扩大到今天仅中心市区建成区就有244平方公里，人口更是从最初的数万人增加到今天的400万以上（指中心市区建成区人口）。虽然单从时间的长短来看，天津城还称不上历史悠久，但它在发展中的急速变化，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后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使这座城市具有了浓重的历史感。老城厢区的名门大院见证了明清两代三岔河口的繁华，“五大道”上的小洋楼记载了天津开埠和中国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的特殊经历。人口发展史是城市发展史的缩影，城市性质的变化和其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无不在城市人口的发展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从天津建城以来人口的变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天津这座历史名城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人口数量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很大，这是人口史研究中必须面对的特殊问题。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同历史时期天津人口包括的范围存在较大的出入。今天的天津市界域与历史上的天津城市范围已不可同日而语。是按照天津现在的界域来研究历史上在这个界域内的人口的变迁，还是根据天津城市实际的成长过程来研究其人口的演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本书选择了后一种思路。我们的目的是要了解在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变迁的历史。另外，按行政区划统计的天津人口，往往其中包含有农村人口部分。由于本书关心的是基于城市发展的人口变迁，农村人口不在我们重点说明的问题之中。不同时期天津的城市人口只限于当时城市区域内实际的人口，不包括虽在行政区划内但不属于城区的人口。因此，本书所反映的天津人口的变迁，严格地说应该是天津城市人口的变迁。

天津建城 600 年来，就城市的的社会性质而言，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860 年被迫开埠和 1949 年解放是这三个时期



之间的分界线。1860 年以前，天津完成了从军事城镇向传统的商业城市的转变。这个过程持续时间很长，占了天津城市历史的四分之三的时间，人口增长缓慢，直到开埠前城市人口才不过 20 万左右。1860 年开埠后，天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时期，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天津迅速成长为我国北方最大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人口迅猛增长，1925 年突破 100 万，到天津解放前，最高峰时超过了 190 万，几乎是开埠初人口的 10 倍。1949 年天津解放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五十年代天津城市人口激增，到六十年代初，中心市区人口就超过了 300 万。这是天津历史上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此后，虽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但总量仍是持续增加的。与解放前天津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靠人口迁入不同，解放后的增长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累积的结果。伴随人口数量增长，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也都发生了显著的积极变化。

本书对天津人口变迁的描述，将突出以上三个时期的划分，以阐明城市社会性质变化对人口变迁的影响。另外对前两个时期还根据行政建制的变化做了进一步划分，这样，天津建

城 600 年来的历史就分成了五个时期，即：卫所时期（1404 年—1724 年）、府县时期前期（1725 年—1859 年）、开埠后的府县时期（1860 年—1927 年）、天津建市至解放前（1928 年—1948 年）、天津解放至今（1949 年后）。这样划分兼顾了城市的社会性质和行政设置，便于说明人口变迁的过程及在不同阶段的特点。

人口史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的欠缺。由于近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和生命统计在我国是二十世纪以后才开始的，此前的人口资料很少，只有一些零星的有关总户数和总人口的数据，因此本书对二十世纪以前天津城市人口变迁的分析，更多地是一种趋势性、推论性的描述。1928 年天津设市后，虽然各方面的人口统计资料渐渐增多，但很多资料的质量存在问题，统计中的误报、漏报现象严重，许多问题仍不得不借助于间接估计来分析。只有建国以后，随着人口调查和统计制度逐步完善，人口变动分析才有了更科学的依据。由于资料的关系，本书不同章节关于天津城市人口变迁的分析，难免会让读者产生年代越久远，描述越粗略的感觉，这是作者有心但无力克服的遗憾。

目 录

人口繁衍说沧桑	(1)
一 早期的天津人口	(1)
1. 盐业和漕运	(3)
2. 市区人口聚落的形成	(6)
二 卫所时期的天津人口	(11)
1. 天津卫与天津城	(12)
2. 军队人口	(18)
3. 居民	(23)
4. 清初人口	(28)
三 府县制前期的天津人口	(35)
1. 城市发展	(36)
2. 人口数量增长	(41)

3. 人口的职业结构	(47)
四 天津开埠与人口发展	(51)
1. 城市地位提升与人口增长	(52)
2. 二十世纪初期的人口	(57)
3. 民国时期的人口	(62)
五 天津建市后的人口增长	(67)
1. 国民政府时期人口增长停滞	(68)
2. 抗日战争时期城市人口激增	(72)
3. 抗战胜利至解放前的人口波动	(77)
六 人口增长的来源	(81)
1. 人口的自然繁衍	(82)
2. 移民	(92)
3. 城区的扩展	(100)
七 人口结构的变化	(107)
1. 年龄性别结构	(108)
2. 职业结构	(113)
3. 受教育状况	(121)
八 租界地人口与外侨人口	(127)
1. 外国租界	(128)

2. 租界中的人口	(136)
3. 外侨人口	(145)
九 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人口发展	(149)
1. 1949—1979 年的城市人口	(150)
2. 八十年代后城市人口的增长	(158)
3. 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	(164)

— 早期的天津人口 —

八

天津这个名称及其所代表的城市的存在都是从明代开始的，但在此之前，天津城所在地区早已有人口聚居活动。据历史研究，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由于海面下降，天津旧城所在区域已经成陆。当时的海岸线大致在考古发现的第一道贝壳堤附近，即沿今张贵庄、巨葛庄、南八里台、沙井子直到河北省黄骅县一带。以后，由于黄河几次改道流经天津入海，其巨大的泥沙不断造出新的陆地，天津东部的沿海平原逐步向东延伸，并留下了第二道和第三道贝壳堤。黄河第一次北迁到天津地区大约在距今三千四百年的夏商之交。黄河及其主要支流分别在今张贵庄、沙井子和河北省黄骅县伏漪城一带造成了三个河口冲击扇，形成了第一道贝壳堤与第二道贝壳堤（在今东郊



区白沙岭至南郊区泥沽一线)之间的大片陆地和湖泊。到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南迁,天津东部的海岸线逐渐稳定下来。考古资料发现,在天津蓟县北部的燕山南麓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聚落。现在的市区部分,特别是东部地区,出现人口聚落的时间相对晚一些,但至迟到战国时期,现在的天津城区附近也应有了不少的居民点。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在天津市郊发现战国到西汉初年的村落遗址四十多处,其中包括多处战国时期的墓群。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天津地区分属不同的行政建制。历代王朝设置了一系列管理机构,在该地区实行统治。但严格地说,治所在现今天津市区范围内的军事或行政机构是直到金代以后才出现的。《金史》中记载的“直沽寨”可能是市区中最早出现的官方建制。天津地区的开发长期与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的繁荣兴衰直接制约着天津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因此,关于天津早期的人口变迁也必须从盐业和漕运的发展谈起。

1. 盐业和漕运

天津濒临渤海，原为盐碱荒地，有着丰富的盐业资源。早在西汉时期，天津的盐业发展就有了相当的基础。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在全国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其中就有两处在现天津地区境内。制盐业的发展带动了天津人口的增加。不幸的是，西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特别是渤海湾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海啸，包括天津地区在内的渤海西岸村落民居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县治也被迫内迁，盐业生产蒙受沉重打击。

到南北朝时期，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很多人从事着“傍海煮盐”的活动。到了五代，后唐于同光三年（925年）在今天津宁河县内设置了芦台盐场。这个盐场在当时一度曾拥有灶丁（煮盐的人）三百九十三人，灶地五百四十四顷，熬盐大锅四十六面，规模可见一斑。后唐政府还在今宝坻县境内设置了管理盐产销的榷盐院。煮盐在很长时间里是古代天津地区人口所从事的一项主要劳动。

另一项主要的经济活动是漕运。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具有



便利的水运条件。为了调运物资（主要是粮食），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统治者就开始在天津地区修建运河。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先后开凿了平虏渠（相当于现在的南运河从青县到静海独流之间的一段）、泉州渠（北端在今宝坻县境内汇于鲍丘水，即现在的蓟运河，南端在今市区交于潞河，即现在的海河）和新河（从泉州渠的北端向东直至濡水，即今滦河），形成贯穿天津地区的河流干线。隋朝统一中国后，也大量修凿运河。隋大业四年（608年）开凿的经过天津地区的永济渠，南接沁水，北达涿郡（今北京市西南），成为天津地区南北交通水路的大动脉。它与通济渠、江南河等运河一起，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形成了长达四五千里的京杭大运河。运河漕运对促进我国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运河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天津地区的人口聚集自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到了唐代，南北漕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满足向幽州（今北京）、渔阳（今天津蓟县）等重要军事基地的边防驻军供应粮食的需要，唐朝除了继续沿用运河漕运外，还大力发展海运。驻守幽州的节度使被授予“河北海运使”的官职，兼管海运。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中记载了“三会海口”的地方，方位在渔阳郡东南一百八十里处，具体地点目前存在争议。有

人认为就在今天津市内的三岔河口附近，所谓三会海口，指的就是永济渠、滹沱河、潞河汇合入海的地方。但也有人认为应在今年东郊的军粮城，因为军粮城在隋唐时距离海岸线较近，有河流在此入海，军粮城地名本身正说明这里当年是囤积军粮的地方。在现在的军粮城镇西一公里处，有一片高出周围平地约一米的土台，略呈方形，边长一里，据说就是唐代军粮城的遗址。

为了把海运到军粮城的大批漕粮更方便地转运到渔阳，唐神龙二年（706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主持开凿了一条连接今海河和蓟运河的渠道，也取名叫平虏渠。通过这个渠道，南来的漕船就可以源源北上，直抵渔阳了。军粮城作为海运和河运的中继地，成为唐代重要的港口。水利事业的发达和漕运的繁荣促进了天津地区人口的增长。但是到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发生“安史之乱”，北方地区陷入藩镇割据和外族侵扰的战乱之中，天津地区的漕运逐渐衰落，直至停止。

北宋时期，天津地区成为宋、辽交界之地。宋与辽隔雁门关、界河对峙，海河是界河中的一段（当时的海河就称界河）。为了防止辽的南侵，宋朝在天津地区设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称为“砦”（即“寨”），如泥沽、双港、小南河、沙窝、独流、钓台等。这些“砦”以后逐步发展成天津的重要村镇，有些地



名还沿用至今。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再次改道经天津入海。这次黄河北迁造成了军粮城至塘沽间的大片陆地，使海口东移到距今三岔河口七十里的泥沽一带。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南迁，海岸线重新稳定，并逐渐生成了第三道贝壳堤。北宋曾经在泥沽海口设立海作务，制造船只。但由于当时宋辽军事对峙，泥沽海口常常处于封锁状态，海运已远不如唐代时三会海口发达了。

总的来说，随着盐业和漕运的早期开发，天津地区的居民逐渐增多起来。特别是隋唐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海运的发展，天津的人口估计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在今天市区内的三岔河口附近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人口聚落。但唐代中后期的战乱和北宋时期的军事对峙，加上黄河第二次北迁入津，破坏了河运和海运，使在今市区范围内的人口聚落难以存在下去，人口的聚居活动主要分散在今天天津市的一些郊县地区。

2. 市区人口聚落的形成

金灭北宋以后，于天德五年（1153年）把都城迁到燕京



(今北京市)，改称中都。为了保证都城的粮食供应，金政府征调大量民工，重新疏浚运河河道，恢复漕运，以便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向都城运粮。政府任命运河两岸的地方官吏兼管漕运。当时漕运主要由民间的船户承担，称为“纲户”。今天的天津宝坻县内还有叫做“纲户庄”的村名。三岔河口是联系南、北运河和海口的枢纽，由于漕运的复兴，这一带出现了人口聚落。三岔河口西南因地势较高，成了漕运的理想码头。《金史》中把这个地方称为“直沽”，这是史书上对天津最早的称谓。由于直沽在漕运及军事上的重要性，金朝便在直沽设寨置戎，史称“直沽寨”。金贞祐二年（1214年），武清县巡检梁佐被任命为都统，柳口镇（今西郊区杨柳青）巡检李咬住为副都统，领兵戍守直沽寨。这是今天津市区范围内由政府设官置守的最早记录。金代的漕运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据《金史》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经直沽运往中都的漕粮达到了一百七十万石以上。漕运繁忙季节，从靖海县（今天津静海县）到直沽三岔河口一段的运河上，从各地驶来的漕船首尾相接，熙熙攘攘。根据考古发现的成果，金代的直沽寨已初显城市的面貌，当然当时的城居人口还是以军人为主。

元朝统一中国后，也定都北京（元称大都），天津仍然是



漕粮运送入京的必经之路。元初，由于运河淤塞不畅，漕运需要采取河道和陆路接运的办法，费时费力。后来政府对大运河进行了整治，并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均在今山东省境内）和通惠河（今北京市郊），使漕船可以由杭州直抵大都，但由于部分河段水浅，运量受到限制，于是试用海运，由江南平江路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县东北）出发，抵直沽后卸存，然后再改装河船运入京城。至元十九年（1282年）海运试航成功。此后，海运渐趋发达，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已完全取代了河运。元代漕运的规模比金代扩大了许多，年运漕粮可达三百多万石。

当时的直沽是接转海运漕粮的主要枢纽。随着漕运的繁荣，直沽的地域范围也有所扩大，《元史》中出现了大直沽（今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一带）设立了“接运厅”，在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县河西务）设立了“都漕运使司”，还设置了“直沽海运仓”，用于存放漕粮。元朝的漕运是官运，有一只专门运粮的巨大船队。为了加强控制，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在直沽设立了“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司”，派两千名康里军（由西域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防守，另派五千名汉军在直沽口（今塘沽海口）屯田驻防。每年春秋，当大批运粮船达到直



沽时，元政府便派官员和军队，前去监督和保护。

古代的海运是艰险的，沉船翻船事故时有发生。为了祈求海上航行的平安，人们对海神十分敬畏和尊崇。天津大直沽和三岔河口附近都修建了天妃宫（后称天后宫，俗称娘娘宫），每逢出海或抵达，人们都在此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这里渐渐也就成为一个活动中心，周围的商业也渐渐发展起来。人们把随漕船从各地带来的生活用品，拿来在此交易。元诗中有“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瞿越布满街衢”的诗句，正是当时直沽商业繁华的写照。

金元两代漕运的发达使三岔河口一带的人口聚落范围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虽然我们无法从史籍中获知当时生活在现在的天津市区内的确切人口数，但从驻军数量和漕运的规模推算，应该有数千人之众，甚至可能已达万人。

金元两代，天津地区的盐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设立了“宝坻盐使司”和“沧州盐使司”，分别管理海河以北至山海关和海河以南至山东边界的盐务。元代太宗二年（1230年）设立了“大都、河间课税所”，管理盐的产销。据《三叉沽创立盐场碑》记载，太宗六年（1234年）秋天，三岔河口一带“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时人指以为瑞，遂相率诉于官，按验得实，受旨煎